

A S T U D Y O 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经济 一体化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陈广汉 杨柱 谭颖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 S T U D Y O 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经济 一体化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陈广汉 杨柱 谭颖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 陈广汉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1 - 0735 - 8

I. ①区… II. ①陈… III. ①区域经济一体化 - 研究 - 广东、香港、澳门 IV. ①F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179 号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著 者 / 陈广汉 杨 柱 谭 颖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丁 凡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与发展出版中心(010) 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735 - 8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粤港澳的实践	003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003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趋势和挑战	009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国回应	012
第四节 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	015
第五节 深化粤港澳合作的趋势和目标	024
第二章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030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服务贸易自由化	030
第二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理论	036
第三节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045
第四节 负面清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创新	073

第二篇 案例分析

第三章 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093
第一节 港澳资企业在广东投资环境评估	093
第二节 广东省港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状	098
第三节 广东省港资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制分析	104

第四节 广东省港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108

第四章 跨境基础设施合作——以港珠澳大桥为例 112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114

第二节 港珠澳大桥交通流量预测 124

第三节 港珠澳大桥对内地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41

第四节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香港区域发展的影响 161

第五章 养老医疗合作——以澳门长者定居珠三角为例 179

第一节 粤港澳养老医疗的合作基础 179

第二节 长者养老医疗文献回顾与政策评述 181

第三节 澳门养老医疗的现状分析 187

第四节 澳门特区长者定居内地的趋势、原因和特征 196

第五节 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对医疗援助服务需求分析 216

第六节 政策建议 243

附录：案例分析 珠海市爱晖护老院 248

第三篇 共赢战略

第六章 广东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的战略与对策 255

第一节 广东省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背景 255

第二节 广东省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259

第三节 香港在广东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和角色 264

第四节 香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和障碍 269

第五节 广东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275

第七章 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与“服务业走进来”策略 282

第一节 澳门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瓶颈 282

第二节 澳门参与横琴、南沙、翠亨新区发展的 SWOT 分析 293

第三节	澳门参与横琴、南沙和翠亨新区合作发展的模式研究	306
第四节	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315
第八章	自贸区背景下粤港澳深度融合的制度创新研究	320
第一节	特殊区域的经济制度发展	321
第二节	粤港澳合作现状及制度约束	344
第三节	广东自贸区与港澳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346
第四节	粤港澳深度融合典型区域分析	352
第五节	小结	358
后 记		361

第一篇 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家巴拉萨 (Balassa Bela, 1961) 认为, 经济的整合既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 它包括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和种种措施; 就状态而言, 则表现为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消失。广东,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 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社会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 成为港澳与内地经济合作的示范区。2003 年以来, CEPA 及其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实施, 推进了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4 年 12 月, 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 立足面向港澳深度融合。广东自贸区涵盖三大片区: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广东自贸区的建立将给内地和港澳地区, 特别是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本书第一篇主要介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和粤港澳实践的进展情况, 其中, 第一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在此基础上, 全面回顾和总结了粤港澳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 并对未来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目标进行了展望。第二章重点聚焦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重大问题——服务贸易自由化,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 分析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 CEPA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并对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建议。

第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粤港澳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凭借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社会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成为港澳与内地区域经济合作的示范区。从“前店后厂”式的市场分工，到 CEPA 系列协议的签署贯彻，再到南沙、前海、横琴“金三角”的破茧而出，粤港澳三地经济从渐进协作走向多边融合。2003 年以来，CEPA 及其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推进了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4 年 12 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面向港澳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最早被使用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1931 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在他的两卷本《重商主义》中，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贸易融合到一个更大区域的过程。1933 年，两位德国经济学家 Herbert Gaedicke 和 Gert von Eynern 在他们的著作《欧洲的生产—经济一体化：一项关于欧洲国家对外贸易关联性的考察》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他们用“经济一体化”来描述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和经济上的关联性。

“二战”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高潮，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他进一步解释道：“在经济文献里，‘经济一体化’这个术语却没有明确的含义。一方面，两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之间，如果存在贸易关系就可认为是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又是各国经济之间的完全联合。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代表着不同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一个自由贸易区里，参加国之间的关税和进口数量限制被取消了，但每个国家都保留着自己对非成员国的关税。共同市场又超过了关税同盟，因为它还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经济联盟则把对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抑制与对各种国民经济政策的某种程度的协调结合起来，以减少由于这些政策的不一致而造成的歧视。最后，完全的一体化意味着统一的经济政策，其最高形式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该机构的决定对所有的成员国都有约束力。”

经济学家弗历次·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词是经济一体化，已有研究都只说明不同国家加入一个经济集团；事实上经济一体化可以有一国之内各个地区的，也可以有各国之间的；后者又分为区域性的和次区域性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经济一体化作为过程和状态的解释。保罗·斯特里坦（Paul Streeten）也是在1961年指出，“一体化不应该按手段（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可兑换性、自由化等）定义，而是应该定义为目的、平等、自由繁荣”。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则主要从生产要素最佳配置和国际劳动分工方面，对经济一体化的“功能”给予了解释。维多利亚·柯森（Curson Victorja）在1974年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解释了经济一体化，他把一体化“过程”理解为“趋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把一体化“状态”理解为“一体化成员国的生产要素的最佳配

置”。霍兹曼（1976）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向共同市场层次，阐述了一体化是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体化的状态的观点。曼尼斯和索迈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有了新意。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彼得·罗布森（Robson Peter）分别在 1980 年、1990 年和 1998 年，对经济一体化做出了不同解释和系统总结，他首先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并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在某种条件下，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性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1990 年，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差别待遇，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当中，各成员国凭借自身的相对优势，通过经济合作，在共同目标下获得各种单方面行动不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过程和状态”。此外，Robson（1998）认为“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各个独立的国民经济在体制上组合成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理论上有两类方法：一是从过程上测度，即测度各区域间物质、能量、资本、技术等流量；二是从结果上测度，即测度各区域生产率的差异程度、价格水平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等的差异程度。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理论上的原因，基本上是在研究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测度，如 Albuquerque 等（2003）用直接投资测度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Robertson（2004）测度了北美市场的一体化，Martinoia（2009）测度了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而测度一国内部各地区一体化的文献比较少，Gluschenko（2002）测度了俄罗斯各地区的一体化程度。第二，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等原因，研究国际金融一体化，以及用国际证券市场的数据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献占多数，如 Canjels 等（2004）使用纽约市场英镑对美元的汇率的高频数据来研究美国与欧洲的一体化程度，Crocì（2004）测度了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Mary 等（2007）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12 个亚洲地区的商品市场和金融

市场的一体化进行了测度。第三，绝大部分文献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上进行测度，如 Lipsey（1963）使用美国的对外贸易数据，以价格和数量的变动趋势测度了美国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Knette 等（1999）用市场均衡结果——各个区域市场的均衡价格和数量来测度世界市场一体化的程度，Bowen 等（2009）从一体化各区域产量分布来测度一体化程度。从过程上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献比较少，如 Pall 等（2007）用地区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来测度一体化的水平。

三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分析，涉及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投资创造与转移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收入聚敛效应、商业周期效应等方面。

（一）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分析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是 Viner - Meade 分析框架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考虑到价格因素，即贸易条件效应。这两个层面皆属于静态分析。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最初是纯粹理论分析的，直到 Tinbergen（1962）将引力模型率先应用到对外贸易分析中，学界才开始逐渐转向实证研究。Adams（2003）和 OECD（2001）全面综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分析成果。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可能影响世界进出口市场的价格，或者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增，就有必要考察贸易条件效应（Burfisher 等，2003）。鉴别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伙伴间如何分配利益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时，贸易条件效应是重要的评估标准。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的贸易条件改善，尽管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净福利仍可能为正。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经济学者所证明，如 Lipsey（1957）利用无差异曲线，Johnson（1975）使用进口商效用函数，Wonnacott（1981）利用提供曲线都证实了上述论断。Winters 和 Chang（2000）、Chang 和 Winters（2002）分析了西班牙加入欧盟、巴西加入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情况，结果都表明集团外国家的出口价格出现下降，成员贸易条件改

善。这也许是少有的专门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条件效应的实证研究了。

（二）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效应

Kindleberger (1966) 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提出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两个概念。大多数实证分析验证了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带来 FDI 的增加。Baldwin、Forslid 和 Haaland (1995) 实证分析了欧洲单一市场计划 (EC92) 对其成员产生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Francois 和 Rombout (2000) 研究表明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小国来说产生了明显的投资增长效应, 在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盟, 乌拉圭加入 MERCOSUR 以及墨西哥加入 NAFTA 以后, 均发生 FDI 急剧增加的现象。Blomström 和 Kokko (1997) 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他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 FDI 的影响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类型, 前者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有关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规定, 后者主要体现在贸易自由化上。一方面, 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成员关税的下降可能扩大 FDI (市场容量的扩大, 导致更大固定投入的项目也可以投产); 另一方面, 对外关税水平的降低, 可能导致“关税避让” (tariff jumping) 的投资者撤资, 退而求其次转向出口。根据 Dunning (1977) 的“三优”理论, 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分别是一国采取一般出口方式、许可证方式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前提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影响区位优势, 而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影响很小。区域经济一体化对 FDI 的影响, 因地区和产业不同而不同。然而他们的这一分析框架, 并没有具体说明政策自由化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或者什么形式的区位优势对吸引外资最为重要。这只能由更多的学者做出更多的实证分析。

（三）经济增长效应

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尽如人意。Baldwin 和 Venables (1995) 声称没有研究可以确认非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Henrekson、Torstensson 和 Torstensson (1997) 运用虚拟变量, 验证了上述论断, 分析表明

1976~1985年，仅欧洲经济一体化提升了成员方的增长率。Brada 和 Mendez (1988) 分析了 1951~1977 年 CACM、LAFTA、EAC、EFTA、EEC 以及 CMEA 6 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 LAFTA、CMEA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EFTA 为负值，其他三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回归系数并不显著。De Melo、Montenegro 和 Panagariya (1992) 使用跨国比较和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正式统计研究，结果表明早期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没有增加其收入或促进其经济增长。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成立或复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Vamvakidis (1999) 指出，新兴的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应该是具有正向作用的，因为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对于南南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前提下，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从而对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

(四) 收入分配效应

在收入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一个主要问题 (Robson, 1980)。经济学者对自由贸易是否加重了两极分化进行了研究。Karras (1997) 对 1960~1990 年 ASEAN、EU、LAFTA 三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人均收入趋同现象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欧盟内部出现强劲的趋同现象，LAFTA 趋同效果弱一些，ASEAN 没有趋同现象，甚至出现分化。作者由此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必然带来成员生活水平上的趋同。Venables (1999) 同样发现了这一现象，EU 内部成员的人均收入水平趋同，而 EACM、CACM、ECOWAS 成员却出现了分化。总体来说，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成员之间的趋同效应，南南区域经济一体化却加大了成员之间的差距，目前还没有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收入趋同效应的广泛研究。

(五) 商业周期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商业周期的逻辑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或者是产业间贸易，或者是产业内贸易，前者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商业周期不同步 (Krugman, 1993)，后者则使得商业周期趋于同步化。Frankel 和 Rose (1998) 研究了贸易一体化对商业周期同

步性的影响,认为贸易强度的加大和商业周期同步性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Cardarelli 和 Kose (2004) 研究发现,NAFTA 加深了美加墨三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三者之间的商业周期趋于同步化。发展中国家是否如此呢? Shin 和 Wang (2004) 通过研究 1976 ~ 1997 年韩国与其他 11 个亚洲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业周期同步性特征,发现贸易强度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同步性,需求因素、产业间贸易水平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等因素亦如此,只有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才能导致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周期同步化。Calderon、Chong、Stein (2002) 研究了 147 个国家 1960 ~ 1999 年的贸易强度与商业周期同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正相关程度在工业化国家之间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组合;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相关程度高于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趋势和挑战

一 美国主导新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贸区谈判

近年来,正当多哈贸易谈判受阻之际,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谈判、TPIP (美欧自贸区) 谈判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连接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经济贸易框架,并凭借其自身的规则优势开启国际贸易体系新的主导权之争。

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西洋两岸就开始讨论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但因分歧严重以及双方对世贸组织的高度关注而搁置。美国为何在近两年如此积极地推动美欧自贸区谈判呢?表面上看,多哈谈判屡屡受挫将美国政府的视线更多转向区域性自贸谈判。近年来,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2008 年,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市场准入领域中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导致多哈谈判以失败告终,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大而全”的目标,把焦点放在重点产业,

特别是服务业、能源和环境技术以及在亚洲等新兴经济体有庞大市场的消费领域。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欲推动经济转型，并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美国政府也抛出了两大主张：一是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关系新格局，加强地区多边机构、发展双边伙伴合作、建设同盟关系；二是力促“贸易扩展”与提高“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的标准，推动下一代贸易投资以及供应链建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 TPP 谈判，或美欧自贸区谈判，还是美国正在与其他 47 个国家进行的旨在开放服务领域的谈判，都是美国希望构筑全球贸易新体制、重夺规则主导权的重要一环。以 TPP 为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新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TPP 被称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它有别于一般性的自贸协定，TPP 定位于高标准和更全面。以往大多数自贸区协议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服务贸易，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而 TPP 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过一般自贸区协议。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也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积极挑战美国等国家的新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尽快升级。一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博弈与竞争已经拉开大幕。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一体化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盟正竭尽全力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衰退带来的重重挑战。2009 年 12 月 8 日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从 2010 年起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因为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其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实施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外反应的共识，以及改革实施的机制性障碍，欧盟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总是被自身机制和成员之间的分歧所阻滞。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欧元区成员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 GDP 的 3%、主权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 GDP 60% 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与丧失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得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 27 个成员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各方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外围国与核心成员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外围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外围国与核心成员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出现搭便车行为，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可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